

疫情下，現場演出幾成奢求，也激發出表演者的奇思妙想。香港小交響樂團（小交）近日憑藉其6月一場弦樂現場演出錄製成的「Back On Stage」音樂會（戲院特別版）登陸影院，11月底再推「Back On Stage II」呈現其9月一場管弦樂現場演出，成為首個在香港影院上映音樂會電影的香港樂團。古典樂演出上映大熒幕，更像是疫情下一瞬即逝的產物，還是可成為後疫情時代的常態呢？觀眾、表演者、樂界學者，或都有不同猜測。

大公報記者 李亞清



▲繼「Back On Stage」音樂會之後，香港小交響樂團在9月底進行了第2場錄製音樂會



▲觀眾體驗在影院欣賞古典音樂會

小交夢上大熒幕 後疫情啟新樂章

兩部音樂會電影登陸金鐘和太古的MOVIE MOVIE影院，「Back On Stage」放映4場（包括2場加場），「Back On Stage II」則將放映3場。以首部為例，記者觀影後感到影片在約80分鐘的時長中完整呈現了一場演出，一氣呵成，並未為達滿意而一曲錄製多次，雖有瑕疵但貴在原汁原味。

與現場音樂會相較，這場錄播音樂會多角度而富有變化的鏡頭語言是其一大亮點，還使用了航拍鏡頭。後期製作也為影片加入更多元素，具體表現在曲目《四季—夏》的視頻片段配以文字：韋華第曾在此曲總譜扉頁上題的14行短詩，隨演奏進行而顯現在熒幕上，比如「奄奄一息的人們和動物躺在熾熱無情的太陽底下」、「雷電交加的狂風暴雨及冰雹」等，使觀眾更好地理解曲意。至於音響效果則見仁見智，通過影院的環繞立體聲效果，演奏者的動聽之處更加凸顯，同時缺點也放大了。

合作機會視乎市場需求

為了「樂團有嘢做」——這是香港資深樂評人周凡夫猜想小交此舉的初衷。同樣觀看了該影片的他告訴記者，相比在家中看線上音樂會，如此有不少好處：「更加全神貫注了，而且現場有其他觀眾一起欣賞。用大熒幕看的感覺也很好。」他又補充，「下次還可以派份場刊，讓觀眾更有現場感。」小交兩度加場再推出一部，看來觀眾較為歡迎。

小交桂冠音樂總監葉詠詩說道，「我以前就想：如果將音樂會變成像電影一樣——今天想去聽什麼音樂會，就能買票去影院看該多好，看音樂會像看電影一樣平常。」這夢，會成真嗎？且看小交之所以此次能將音樂會搬上大熒幕，重在影院配合，若這種形式要發展成為常態，則先要與影院達成一致。周凡夫說：「MOVIE MOVIE意在尋求一些有別於傳統的另類節目，與小交這次的構想頗為契合，達成了合作。而未來兩者合作的機會有多少，也要看市場等因素，樂團與影院合作亦需成本。設想在內地，影院要上映的



▲香港小交響樂團「Back On Stage」音樂會（戲院特別版），近日登陸MOVIE MOVIE影院

影片可能多到自顧不暇，還會否願意為這類並非大熱電影的音樂會電影安排檔期？」

把劇院內的現場演出製作成錄影版本，並在影院上映，並非新鮮事。早在2006年，美國紐約的大都會歌劇院已經開始把他們的歌劇製作以高清格式拍攝，在影院作現場轉播或重播。這個名為The MET: Live in HD (MET Live) 的系列可說是開了在影院放映演出的先河，令世界各地的觀眾不用飛到紐約林肯中心，也能欣賞到國際級的精彩劇作。英國國家劇院亦自2009年起開展了類似的NT Live劇場廣播計劃。香港後來引入了MET Live和NT Live，入座率均不俗。

若這種形式受到大眾認可，不僅能把作品推廣給更多觀眾，對藝團來說也是拓展收入的方式。不過，有別於以上例子中所演出的歌劇、話劇，將古典樂演出上映影院的做法還較少有耳聞。從視聽語言看，不少歌劇和話劇演出都有飽含戲劇張力的故事文本、精良的舞美設計等，在大熒幕上，古典樂演出似乎不及前者有衝擊力。

時長和選曲需有所考究

此外，時長和選曲也是音樂會電影需有所考究的，在沒有「中場休息」的情況下，既要令演奏者不至疲累，也要令觀眾觀影時不感吃力。小交首部電影中演出的4首曲目多篇幅較短、情緒不甚沉重，除了韋華第《四季—夏》還有巴托克《羅馬尼亞民族舞曲》，比貝《戰爭》和葛利格《霍爾貝格》組曲。

毋庸置疑的是，此番小交費了心思、勇氣可嘉，為今年起香港受疫情影響嚴重的演藝活動之河開闢了一條新溪流，正如周凡夫所說：「（將古典樂演出上映影院的做法）首創與否不重要，重要的是夠膽去試。」

假設樂團與影院達成長期合作，那麼疫情過後，音樂會影片與現場音樂會並行，前者能否依然有市場？始終，現場音樂會有它不可取代的位置。周凡夫認為，未來雖會有種種困難，音樂會電影仍有發展空間，並說：「到時有多少觀眾願意走入影院看音樂會，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影片的內容。另外音樂會電影在價格上可能更有吸引力，比如這場影片的票價是130港元，低過小交現場音樂會的平均票價。」

對觀眾來說，線上音樂會的好處是安坐家中，隨時可欣賞，周凡夫說：「線上音樂會也對長者觀眾友好，他們平時有聽現場音樂會的習慣，疫情帶給了他們新方式和新思維。」不過，眾多樂團和音樂家卻難以用線上演出維生，周凡夫提及甚至是規模較大的線上音樂會組織如柏林愛樂數字音樂廳，「似乎至今都仍未收回成本。」

部分圖片：受訪者提供



▲周凡夫認為，音樂會影片在未來有發展空間

大公報記者李亞清攝

9月在灣仔的一間酒店裏，小交客席指揮、德國指揮家柏鵬（Christoph Poppen）度過了演出前的14日隔離。帶了足足40公斤的書和樂譜、還有一把小提琴的他告訴記者，他為每日的隔離生活制定了計劃，而他的房間坐擁維港海景，伙食也不錯。疫情下，今年1月下旬起已經沒有外國古典音樂家來香港演出，而這個紀錄到9月26日的小交音樂會告終，柏鵬為此場演出擔任指揮。

大公報記者 李亞清



▲柏鵬是今年1月下旬起首位來香港演出的外國古典音樂家



▲成為指揮之前，柏鵬已是知名小提琴家。圖為他與鋼琴家克里奇於9月底香港小交響樂團的音樂會演奏



▲柏鵬表示，疫情下世界各地的音樂家和樂團、合唱團都在經受着困難時刻

柏鵬不懼隔離 訪港獻藝

「以往我常處在繁忙工作的時間壓力中，疫情讓我放慢了生活的腳步。」柏鵬在電話中告訴記者。這位常駐慕尼黑的音樂家說，「不過我仍有很多工作職責，還要為以後的演出研究樂譜。」開心的是，工作之餘，他多了些練琴、看書、和家人相處的時候。

「聽錄音與聽現場的不同，就像視頻與見面」

除了指揮，柏鵬這次也參與演奏，與他同期在香港隔離、也為了那場音樂會而來的德國鋼琴家Alexander Krichel（克里奇）合演貝多芬的「春天」奏鳴曲。這場音樂會沒有現場觀眾、而是由音樂家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錄影演出，原因是疫情下的特殊規定：大會堂9月底前不會開放予現場演出。柏鵬說：「觀眾對音樂演出來說是很重要的部分，沒有現場觀眾，演出效果多少會受到影響。」

「世界各地的音樂家和樂團、合唱團都在經受着困難時刻，只有部分獨奏家可以舉行小型音樂會。比如我此前赴韓國的音樂節，韓國早前恢復演出，但8月起疫情反覆，原本的一些演出取消，只有部分進行。」赴韓國演出時，他已歷經過一次隔離。

柏鵬續稱，「不少中小樂團比大型樂團更為艱難，因售票是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比如我擔任首席指揮的科隆室樂團，就要依靠明年新樂季的售票。」對

於疫情後古典樂的觀眾群會否回歸，他較為樂觀，並說：「音樂廳裏不是太過密集，惟要保持安全距離，這是我們需要提醒觀眾的。」

互聯網時代，不少人選擇在網上聽錄音、而不是聽現場，因錄音更易接近完美。柏鵬又作何感受呢？他說：「聽現場時，聲音到達身體，那種震撼和真實是無可比擬的。就像我在隔離，雖然可以通過視頻、語音和人交流，但代替不了面對面的溫暖。」

隔離期間他每日以「我的隔離日記」視頻在小交社交媒體上與觀眾見面，一次他演繹了巴赫第二無伴奏小提琴組曲的《薩拉班德舞曲》。成為指揮之前，他已是知名小提琴家。近年來往於世界各地擔任指揮的他，出差時多是行程緊密，不會帶上小提琴。記者猜想，這把小提琴可曾在柏鵬身為小提琴家時，隨他周遊世界？他說：「那把琴被我賣掉了。現在這把是朋友借出的，和我那時用的琴來自同一位小提琴製作師Guadagnini、也是他同時期的作品（誕生於約250年前），我很喜歡。」

「交響樂團不就是大一點的室樂團嗎？」

要說由演奏轉型指揮的、或是兩者皆傑出的音樂家，20世紀美國小提琴家及指揮家梅紐因就是代表，他少時以小提琴演奏震驚樂壇，晚年以指揮活躍舞台。如今64歲的柏鵬，在32歲時聯合創立了凱魯比尼四

重奏，於世界各地演出室樂近20年，涉足指揮時約47歲。柏鵬回憶道：「那時有人建議我去指揮，我想，交響樂團不就是大一點的室樂團嗎？我的室樂經驗豐富，有些信心，於是開始嘗試。後來越來越多的樂團找我指揮，我便在這條路上走了下去。」

「在某種程度上，指揮比小提琴簡單，不過那是在起步時，後來越來越難。」他說。「我的指揮生涯開始得晚，未有像小提琴一樣在音樂學院學習。我多從前輩指揮家們身上汲取經驗，比如英國指揮家Sir Colin Davis，芬蘭指揮家Jorma Panula，而對我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意大利指揮家Claudio Abbado——我在樂團演奏時從他的身上學到很多，他對樂譜非常熟悉，並且他不是控制型的指揮，將樂手當成夥伴。那時我已有些指揮經驗，於是一邊學習，一邊摸索。」柏鵬自2015年與小交合作至今。在他看來，樂團的個性正愈發凸顯，且擅長具有表現力的演奏：「樂團中每個樂手都加入自己對音樂的理解，正是他們的個性，凝聚成了樂團的個性。打動了自己，才能將音樂送達到觀眾的內心。」

訪問尾聲，記者問道，如有14日在香港、不需要隔離，會怎麼度過？他在電話那頭豁然一笑：「我多次來港，卻從未有過這樣的時候。我想去海灘、去爬山，看一看那些至今還只在照片中看過的動人風景。對我來說，香港像是家。」